

復旦 文史丛刊

# 明末江南的 出版文化

[日]大木康 著  
周保雄 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復旦 文史丛刊

#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

[日]大木康 著  
周保雄 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/ (日)大木康著; 周保雄译.  
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4. 11  
(复旦文史丛刊)  
ISBN 978-7-5325-7372-1

I. ①明… II. ①大… ②周… III. ①出版事业—文化史—研究—华东地区—明代 IV. ①G239.27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78935 号

复旦文史丛刊

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

[日]大木康著 周保雄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2.5 插页 6 字数 174,000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2,100

ISBN 978-7-5325-7372-1

K · 1922 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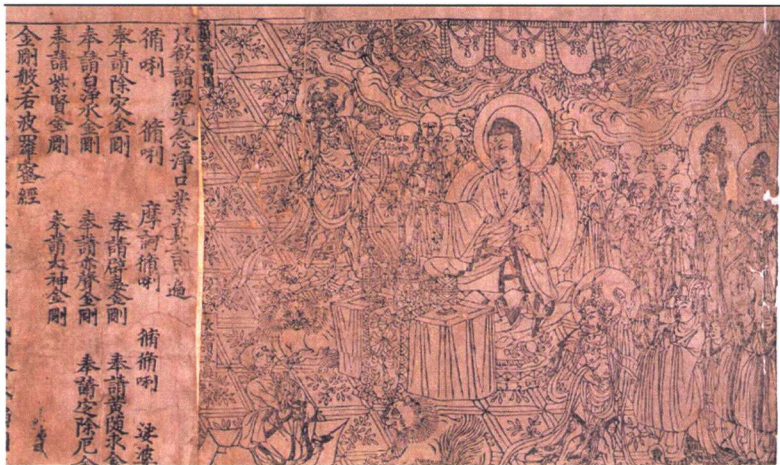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本《金剛經》

**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卷之一**

三台山人仰止 金季纂  
書林鑿堂 文吾 余氏刊

**天文門** ○太虛元化之圖

**天類**  
天者知人亦尊亦若  
見則主天上平之端  
也

○天者有五行曰天晴  
○有日月星辰形類曰  
○春秋之前天地折火  
○登並臻星天知覺  
○天關有人則主者  
○主壽或積年餘天或  
○天關 三下除其凶或有青  
○黃雜也或紅光極耀  
○上謂極者極者謂之  
○天關者極者謂之

○無名天地之始太極靜而生陰  
○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鷄子  
○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元氣  
○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

○無名天地之始太極靜而生陰  
○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鷄子  
○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元氣  
○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

○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鷄子  
○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元氣  
○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 
○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

图2 《万用正宗》（福建刊本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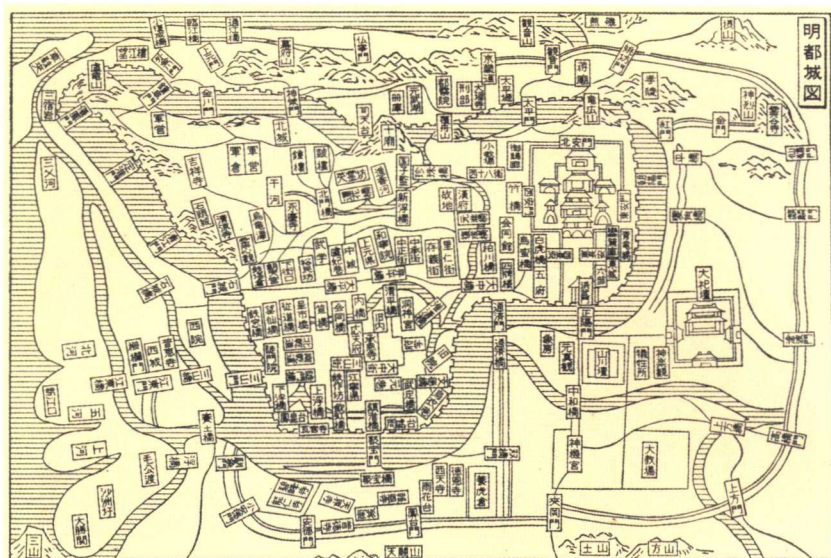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明都城图



图4 明代进土地域分布图

以此而過亦所難辨字出身於橋不為標也孟思物  
 人馬子誠然全往烏木埋飲去了又與吳蘭道志所全孔既白  
 云將車冰公于前古爾是口埋飲燒起個女些標兒烟火也  
 敗在此處而近亦可越標未出吳於橋不陸世標也高曉陽死  
 盡其張登飲全竟時痛言埋飲去日孔既白喻以罪勝過云衣  
 趨回走上前未埋埋先生財我相隨眼誰見爭我多身亦得相  
 箇今日日運天故先生前示用李是胡兒孔既白應真差味把首  
 壹個單去之也怎奈有吳確是國明口有甚確他先生何不  
 龍未死時曾言日將車換世之陸其標得味思厚耳今日得過其成你  
 必然放過故此示於車間明是斬殺其文醜放過他的恩英先  
 性怕我如此符我差筆之下全世尤怨甚不這那望而過村之好何  
 擒住此時竟道水車味去羊弟若是世標必陸那望而過村也  
 親筆之下全世之二地全世三起國年忆去打於 詩曰  
 代代全應 上 有標雖甲放酒老 坐下飛幾千里思  
 隨代否 標身標 慈心空鏡面而吃 寄龍大刀鬼神降  
 五下單全世集集人聚志雲場

图5 傩戏剧本



图6 歙县唐模村的农户



图7 棠樾牌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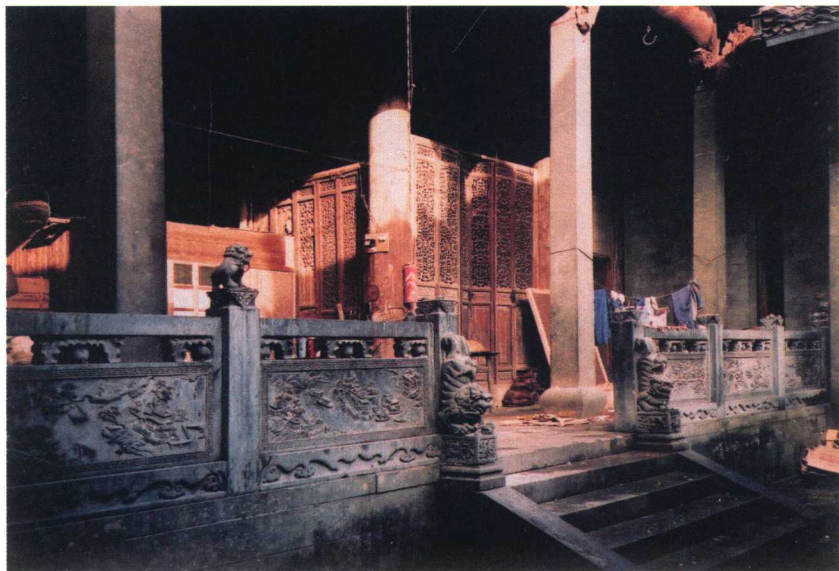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8 吴氏祠堂



图9 虬村





图10 《青楼韵语》插图上 树后有刻工署名“黄一彬”

那阿相思磨花  
湖花露白荷晴



图11 《青楼韵语》插图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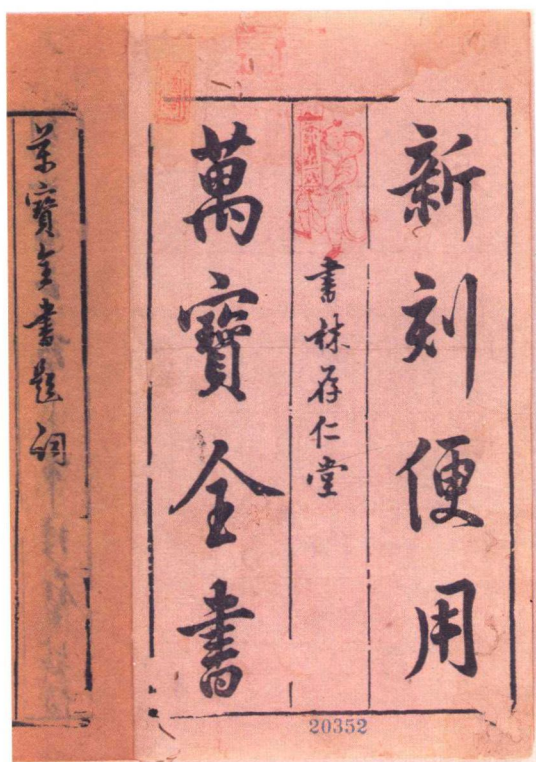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2 《万宝全书》封面



图13 局部  
上标有“每部价银一钱”



## “复旦文史丛刊”编纂说明

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后,致力于推动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,近期重心是围绕着“从周边看中国”、“批评的中国学研究”、“交错的文化史”和“域外有关中国的文学资料与图像资料”、“宗教史、思想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”等课题进行探讨,同时,也鼓励其他相关文史领域的各类研究。为此,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,出版这套“复旦文史丛刊”,丛刊不求系统与数量,唯希望能够呈现当前文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材料、新取向、新视野和新思路,并特别愿意收录年轻学人的著作。

本丛书基本体例如下:

(一) 本丛刊收录有整体结构和完整内容的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专著,不收论文集。

(二) 本丛刊内所收专著,一般字数在25—40万字,个别情况可以超过此限。

(三) 接受国外以其他语言写成的专著的中文译本。

(四) 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,书后要有《引用文献目录》,如有《人名索引》和《书名索引》,则更为欢迎。

(五) 本丛刊设立匿名审稿制度,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聘请两位国内外学者担任匿名审稿者,如两位审稿者意见和结论彼此相左,则另请第三位审稿者审查。

(六) 本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。

2008年5月

# 序 言

一项技术革新及其普及,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,进而改变此后的社会形态,这类事例绝非罕见。在中国,纸的创造(毋宁说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的实用化)和印刷术的发明,作为新技术而备受瞩目,更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。纸的发明被认为是在公元2世纪初;而印刷术虽然在10世纪以前就已诞生,但直到10世纪左右为了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实用化。平田昌司的论文《从纸与印刷所见的汉语史断代》(《山口大学文学会志》第三十九号,1988)考察纸与印刷术的发明给汉语史(特别是其记录史)带来了怎样的影响,论证了在东汉与北宋时期,这两项发明给汉语史带来的巨大质变。另外,清水茂《纸的发明与东汉学风》(《东方学》第七十九辑,1990)也指出:纸的发明给书籍普及和信息传递带来了巨大变化,进而产生了学风嬗变,并导致了东汉末年知识阶层对体制的批判。同样,清水茂《印刷术的普及与宋代学问》(《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东方学论集》,东方学会,1997)论述了宋代由于书籍的普及,以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伦理开始向普通民众渗透,与此相应产生了朱子学;朱子学之所以以福建为根据地,与那里是当时的出版中心或有关联。

有关纸的发明暂且不论。印刷术肇始于唐代、盛行于宋代,这种观点如今已是常识,从以往中国印刷史的相关记述大致可见,人们对宋代的论



述耗费了许多篇幅,而对宋以后的历史,尤其是明清,只停留于比较简单的陈述。

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倾向,存在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,迄今为止,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而被记述下来的。技术史家的着眼点在于某一技术被发明的某一时间点,对这之后的发展不太关注,这种情况似乎颇为普遍。就明代印刷进行专题论述的论文为数颇少,其中之一便是 K. T. Wu(吴光清)的“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”(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Vol. 7, 1943),然而他的论文也多是新技术的侧面——套版印刷、木版插图、铜活字、覆刻本的制作等来把握明代印刷的特征。

另一个原因是,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印刷术,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先于约翰内斯·古登堡(译者注: 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, 约 1400 ~ 1468, 德国人, 西方活字印刷的发明者)的发明。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印刷史中,中国的活字印刷被大书特书,仿佛失去了轻重平衡。但是,与能用 26 个字母标记的欧洲语言情况不同,印刷汉字文献必须制作的活字难以数计,曾经的活字印刷未必是最佳方法。事实上,采用活字印刷的,常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部分富豪(在此意义上,由乾隆皇帝命名的“聚珍版”颇具象征性);相反,廉价的坊刻通俗书籍则是由木版印刷。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。

偏重于宋代印刷、重视活字印刷,以往的中国印刷史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书写而成。笔者则对这些印刷史的叙述持有怀疑。

当然,在年代更久远、书籍文献更珍贵的意义上,同时也在美术价值上,我对宋版书受珍视没有异议。只是,如果从我们今日对图书馆的利用感受来看,偏重宋版的想法实有不妥之处。现在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、常为我们查阅的中国图书几乎都出版于明代以后——其实大部分是出自明代后半期,说是嘉靖(1522 ~ 1566)、万历(1572 ~ 1620)以后的版本也不为过。这不仅对于任何以明代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是如此,即使是先秦文献、唐代书籍,我们也几乎都是依据明代以后的版本来阅读的。另外,即使存在宋版,人们通常也不是观看其实物,而是阅读后世的覆刻

本(包括今天的影印本)。思考中国书籍的历史时,认为在明朝的嘉靖、万历时期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,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?

论述到此,我们已经可以预设一个反论。宋元版书籍之所以稀少,是由于宋元时代和现代在时间上间隔巨大,在时间上距离越远,留存资料就越少。相反,明清与现代的时间间隔较小,留存资料也就较多,是否真是这样呢?就此疑问,我想以下图做答(图1):两图均以时间为纵向,以出版量为横向。如果假设宋代以来出版量大致为一定数量时,现存书籍册数就应如图A所示,呈均衡的金字塔状,这描绘出年代越古书籍越少的形态。然而实际上,如同我在第一章第一节所考察的书籍数量,书籍册数的演变大致呈现为图B,即:宋元及明初、中期的书籍稀少,嘉靖、万历以后的极多。即便加上现已散佚、仅从目录得知的宋元版书籍,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。而且,如果我们假设在嘉靖之前发生重大战乱,流传下来的书籍一时间遭到毁灭,图B那样的形态也就能理解。而事实上那时并未发生战乱,相反,倒不如说如同第三章第四节所述,可以认为,明末清初的战乱促进了用以传递信息的作为媒介的出版物的发展。书籍的现存状态之所以呈图B那样分布,只能认为是由于明朝嘉靖、万历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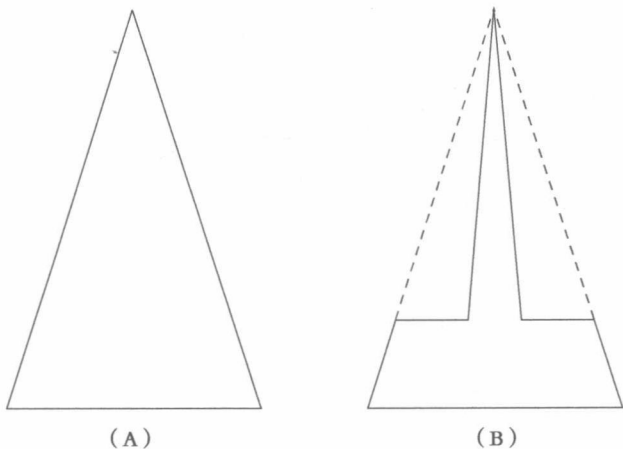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笔者原本以晚明白话小说为研究对象。晚明时期,以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为首的白话小说的出版数量显著增多,皇皇巨作开始刊行,之前所出白话小说与这无法类比。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?在探索其缘由的过程中我开始思考:在当时白话小说流行的现象背后,是否整个出版业更为普遍地繁荣昌盛?就这样,我从事起明末出版文化的整体研究。

本书中,我首先要研究明末书籍出版量的实际变化及其背景,其次想探讨其学术及社会影响。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下的现象,它又是如何规定了明末以及此后社会、文化的走向的呢?这项验证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。

书名中有定语“明末江南的”,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“江南”,是因为笔者的主要研究对象——冯梦龙、陈继儒等文人俱活跃于江南地区;也如正文所述,该地域在当时是出版文化的发达区域。这里所说的“明末”,大体上是指从嘉靖至隆庆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这一时期,与一般以万历以后为明末不同,这得事先说明。

本书对笔者1991年1月所发表的《关于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》(《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》第五十卷,特辑号一)进行了润饰和补充,再加上了之后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。